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名寺



陈鸣 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85309

“十大”系列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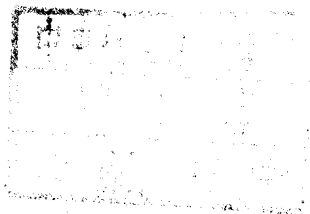


200267852

十大名寺



陈鸣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系列丛刊

十 大 名 寺

陈 鸣 主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经售处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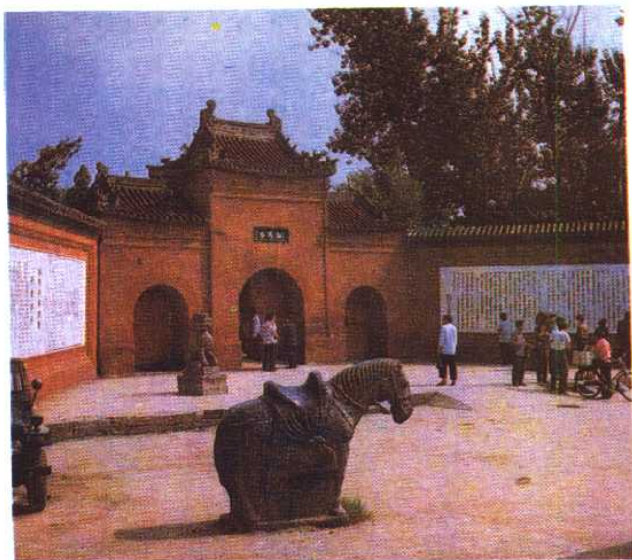
开本 787×960 1/32 插页7 印张6 字数100,000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5-1393-9

K·145 定价: 3.00元



洛阳白马寺



天台国清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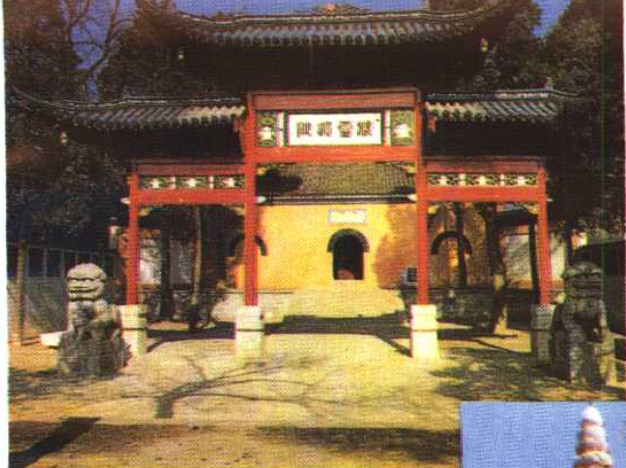
庐山东林寺



嵩山少林寺

杭州灵隐寺





扬州大明寺



南京栖霞寺(舍利塔)



福建南普陀寺

陕西 法门寺



北京 雍和宫

前 言

寺庙是一种颇具神奇魅力而又十分复杂的中国文化物质形态。作为宗教场所，寺庙是中国佛教的活动据点，古印度佛教的东传、中国佛教宗派的产生和兴衰、中国重大的佛教事件、佛教名僧等，都与寺庙有关；寺庙又是中国宗教园林的一大典范，它融会了中国古典建筑形制和古典园林的技法，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主题性园林类型；作为文化区域，寺庙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有许多寺庙成为城镇乡村百姓集市贸易和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作为旅游名胜，寺庙又是中国旅游文化的宝贵资源，从古代的帝王将相、文人贤哲、武士侠客到今天的中外游人，都曾在寺庙内留下了游赏观光的足迹。因此，寺庙是一种综合了佛教、建筑、园林、庙会和旅游

等多种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的宗教文化物质形态。

一般地讲，寺庙建筑布局的产生和定式，从物质形态方面展现了中国佛教的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东汉末年，洛阳白马寺的建立标志了中国内地佛教的正式确立。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的成熟给寺庙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于是，寺庙在改造古印度佛教建筑样式的同时，与中国院落式的宫殿建筑格局结合，导致了建筑形式上的转换，初步确定了四周封闭、中轴对称、殿堂次第排列的基本平面空间格局，从而产生了都市庭园式寺院园林的类型。与此同时，庐山的东林寺、嵩山的少林寺等一些寺庙，也开始借助自然地理环境，探索山林型的寺院园林。隋唐以后，中国佛教宗派纷纷涌现，寺庙选址由都市走向山林的倾向才形成一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南京栖霞山的栖霞寺、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扬州蜀岗的大明寺等，几乎都建在山川林岗之间，这些名山名寺也就成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发祥地。以唐朝百丈怀海禅师为代表开创的佛教丛林制度和禅院建筑形制，经过后人的加工和充实，使中国寺庙的建筑在布局上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即佛塔由过去的寺内中心位置移到寺内一侧，抑或请出寺外，从而大体规定了中国寺庙立体空间的态势。

以南宋禅院“五山十刹”之一的杭州灵隐寺为主流，中国各地寺庙先后都受到禅院化的冲击。元朝是中国内地寺庙的定式时期，寺庙主体建筑一般分布排列于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依次是山门、山门两侧是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和藏经楼；寺庙东西两侧是东西配殿、僧人生活区和旅馆区。与此同时，元朝藏传佛教崛起，至明清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广为传播，北京的雍和宫便成了中国内地首屈一指的格鲁派寺庙。于是，在中国内地寺庙建筑形制定式不久，汉藏寺庙也开始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

近代中国佛教虽呈式微趋势，但佛学却渐见复兴，以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等为代表，开创了在寺庙内设立佛学院的一代风气。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和重视名寺古刹的修复工作。在中国佛教界和海内外爱国人士的积极努力下，中国各地寺庙相继得到了修缮和重建。尤其是陕西法门寺塔地宫真身佛指的发现，揭开了数百年来历史悬案，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迹。

综上所述，中国寺庙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曾经有过数万座庙宇遍及全国各地。今天，我们要从如此悠久、如此众多的寺庙中选取十座名寺，确实是一件颇难周全的事情。本书所选的这

十大名寺，是在反复酝酿、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商量后决定的。一方面，我们从时间的纵向方面，试图揭示中国佛教各主要宗派寺庙的特征和各历史时期主导性的寺庙；另一方面，我们从空间的横向方面，既照顾到寺庙的地区风貌，又能展现汉藏寺庙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这十大名寺的介绍和探讨，能使读者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寺庙的历史和现状，获得一个基本的了解。当然，能否体现我们的初衷，还有待读者来评定。

本书主要由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同志执笔撰写。在选题和定稿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文化所所长姚汉荣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二编室主任王镇远先生和责任编辑曹明纲先生的关心和指导，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

陈 鸣

1992年4月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目 录

1	前 言.....	陈 鸣
1	白 马 寺.....	陈 鸣
17	国 清 寺.....	卢苇菁
34	东 林 寺.....	陈 鸣
52	少 林 寺.....	陈 鸣
72	灵 隐 寺.....	李一苇
92	大 明 寺.....	贺圣迪
114	栖 霞 寺.....	孙小力
133	南普陀寺.....	蒋 伟
151	法 门 寺.....	陈 鸣
169	雍 和 宫.....	陈 鸣

DJ61/18

白 马 寺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是宋朝史学家司马光的诗句。确实，北望黄河中游、南临洛河伊河的洛阳城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就是首先在洛阳西北的仰韶村发现的。自东周以来，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先后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因此洛阳城素有“九朝故都”的美称。

在历史上，洛阳古城曾经有过三次较大的变迁：第一次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迁都于洛阳王城；第二次是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由长安迁都于洛阳东京；第三次是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营建洛阳东都。这三次迁都和建都活动，在地理位置上形成了三座不尽相同的洛阳古城城

址。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就建在汉魏东京洛阳城外(今洛阳市东15公里处)。

汉魏时的洛阳不仅是屈指可数的中国古代大都城，而且也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它曾经拥有一千三百多座佛教寺院。洛阳城内的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有一千多间僧房楼观，位于寺中心的九层佛塔高四十多丈，全寺华丽雄伟，气势非凡。相传当年南天竺(今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由广州北上洛阳，看到这座寺院后，连声赞叹，自称年已过百，周游世界各国，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丽的寺院。(见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然而，当年洛阳这些佛寺历尽人间沧桑，至今都已荡然无存，唯有城外那座白马寺，却幸免于难，安然独存。

一、“永平求法”的传说

今天，当人们来到洛阳白马寺前的时候，迎面就能看到寺院牌坊式山门上方镶嵌的“白马寺”三个字，旁题“司礼监太监黄锦重建”。这是明朝嘉靖年间，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扩建白马寺时所题的寺名。寺院山门前现在左右两侧各站立着一匹青石圆雕马，身高1.75米，长2.20米。相传这两匹石雕马原在永庆公主(宋太

祖赵匡胤之女)驸马、右卫将军魏咸信的墓前，1935年由当时白马寺住持德浩和尚迁来此处。站在白马寺山门前，凝视着那两匹稚朴可爱的圆石雕马，人们也许会问：佛教何时由印度传入中国内地？中国佛教建筑为什么要用“寺”来命名？而眼前这座寺院又为什么叫“白马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从一个流传甚久的“永平求法”的传说谈起吧。

“永平求法”的传说在中国许多古书里都有记载。据说东汉永平年间的一天夜里，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里遇见一位神异的金人。那金人身高六丈，背项放光，从空中飞行而来。汉明帝不知道此梦是凶是吉，第二天一早便召集群臣，想要问个明白。听了汉明帝的述说，一位名叫傅毅的大臣叩首答道：“皇上昨晚梦见的金人是天竺(今印度)的佛。”于是，永平七年(64)，汉明帝派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多人由洛阳出发，到天竺寻求“金人”。这十多位西行求法者，过天山、越葱岭，辗转来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在那里，他们碰上了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并邀请两位高僧来华。一路上他们用白马驮着收集来的佛经和佛像，于永平十年(67)回到洛阳。第二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雍门(古代城西从南向北数的第二门)外，根据天竺

佛寺式样，建造了一座寺院，取名“白马寺”。这就是“永平求法”的传说。尽管这个传说带有某种神秘离奇的色彩，甚至夹杂着一些虚构的因素，但是长期以来它不只被看作是流传于民间的神话故事，而且一直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基本公认的事实。

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历史上有过许多种说法：有人把它追溯到三代以前，如刘宋时宗炳的《明佛论》；有人说是周代，如梁僧祐的《弘明集后序》；也有人说是战国末年，如晋王嘉《拾遗记》；或说是秦始皇时代，如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当然，佛教东传与西域开通有关。汉时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县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地区。当时，这一带的三十六国都受到匈奴的控制。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为联合西域地区的大月氏共同抵御匈奴，派张骞等人出使大月氏。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派张骞率三百人出使乌孙（今新疆天山以北地区），正式沟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只有从这以后，印度佛教才有可能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因此，现代佛教研究一般把两汉作为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内地的时期；虽然梁

启超等人认为印度佛教的传入，走的不是西域陆道，而是南方海道。

不管怎么说，永平十一年建立的洛阳白马寺，尽管难以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最初标志，但它却是目前有史可考的现存的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以“寺”命名，也由此肇始。众所周知，古代印度佛教建筑的名称是“伽蓝”，而“寺”是中国古代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称谓。据传，当年蔡愔等西行求法回国，汉明帝就将摄摩腾和竺法兰迎至洛阳城的鸿胪寺，于是，这两位印度高僧就在这座管理朝祭礼仪的官署内，翻译了中国第一部佛教经籍《四十二章经》。也许受到鸿胪寺名称的启发，一年以后在洛阳城外建立的佛教建筑，就取名为白马寺，从而使中国的佛教建筑一改古印度的“伽蓝”之称，而被正式定名为“寺”。

至于洛阳白马寺何以以“白马”为名，中国历史上历来存在两种说法。以《洛阳伽蓝记》作者杨衒之和《水经注》作者酈道元为代表，从“永平求法”的传说中得出结论，认为当年蔡愔等西行求法，是用白马驮回佛教经书和佛像的，因此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就把建立的寺院取名为“白马”。而《理惑论》作者牟融和《高僧传》作者惠皎，却在古代印度佛教故事里寻找依据。这个故事